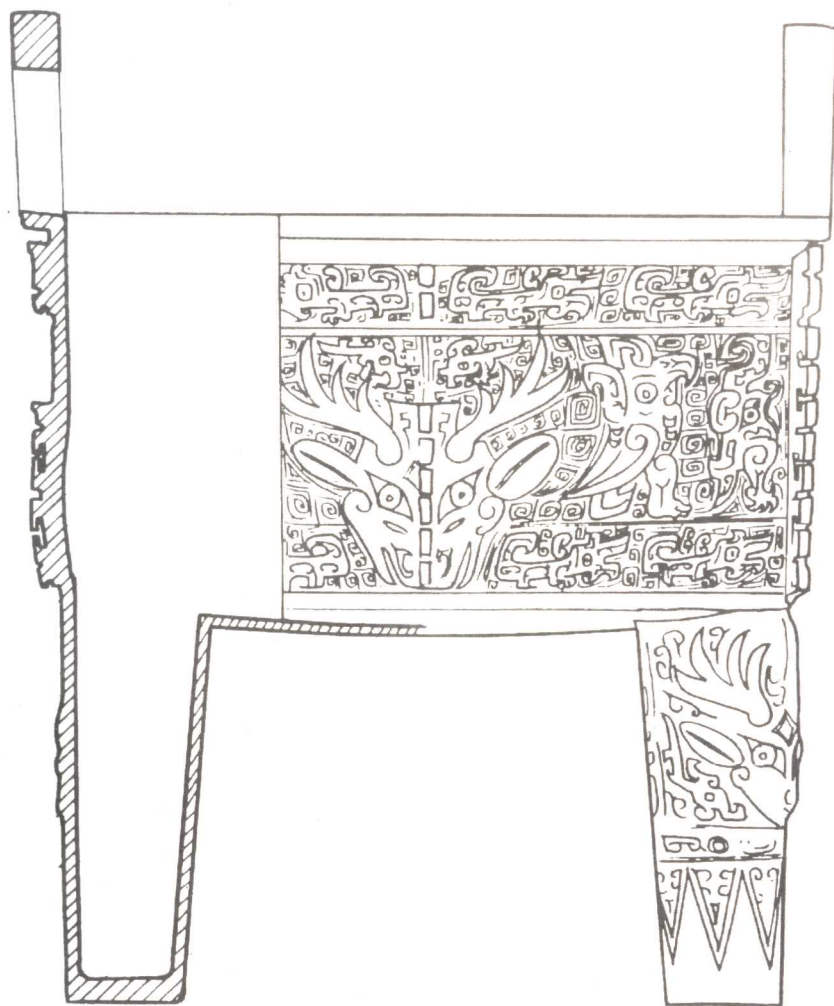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尚书新解



大政宪典



何新
著

时事出版社

K21.04

4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尚书新解

——大政宪典

何新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书新解:大政宪典 / 何新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1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I. 尚… II. 何…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商周时代 ②尚书 - 注释 ③
尚书 - 研究 IV. 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506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本书印张: 17 本书字数: 280 千字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书总印张: 236.5 全套书总字数: 4100 千字

全套定价: 680 元 (15 册)

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1 面对 21 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肇始和文明滥觞的英雄时代。

女娲是敢于蹈火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大禹，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

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

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于宿命的驯服。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

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化身吧？！

2 然而,“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后人对传说的上古英雄,三皇五帝,其名或能知之,其事则鲜能详之。

近世以来,疑古骂古之风倡行,时髦的是数典忘祖。

许多人因此也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本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忘记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是出自一种久远的英雄世系。

“中华”得名源于日华,所谓“重华”,所谓“神华”。“汉”之得名源于天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郑玄云:“天河谓之天汉。”《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晋书·天文志》:“天汉起东方。”《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埤雅》:“水之在天为汉。”《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由此可知,“中华”得名于重华,即太阳。“大汉”得名于天汉,即银河。^①太阳与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

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千百年眼》。其书序云:“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迷目阿堵(阿堵,即金钱别名),则泥首典籍作蠹虫耳。迷于利者无足论,即迷于书籍者,多从耳根入,偶拾前人舌余,即以为定案……非是千百年胸次,谁能上下剔其隐微,晰其源委?”

面对未来,世途多艰。而多难兴邦!我们今日更需要慎终追远,呼唤一种英雄的精神!“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①天汉本为天河名。传说汉水源自天汉,刘邦封汉中王,取天下后用“汉”为国号。汉武帝用“天汉”为年号,纪为纪年之名,后乃为华夏族名。《淮南子》:“天河者,天神之关也。”《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张衡《灵宪》:“水柱为天汉。”

3 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5000 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论语》、《孟子》、《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之源。三部《礼》经是中国制度设计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数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就根本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下，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作完所拟构的全部工作。那么，我拟出版我在 1983—1999 十几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不能作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 新

2001 年 5 月 22 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序·重估《尚书》的民主理想以及梅颐之献《尚书》

1

《尚书》是我国古代政治文献中一部最古老的著作,包括公元前五千年到两千年前间的许多政事记录和诰誓文令。其文献来源于华夏民族最古老的国家政典档案。

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离离然若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孔丛子·论书第二》)

中国之成文史,以《尚书》记录为最始,因此其价值极其重要而珍贵。

先周时代,《尚书》本藏于王室宗社,包括所谓“三坟(藩/谱)、五典(政)、八索(绳)、九丘(州)。”《左传·昭公十二年》先周之诸邦各国皆有本邦国的王室档案,即所谓“春秋”、“棊机”(何按:棊机是鳄鱼古名。以鳄鱼皮为图经,即传说中之“龙图”)、“乘”(即“册”之转语),是皆为各国之“尚书”。

春秋之际,战乱频仍,王室凌夷颠覆,周之王政亦不存,典籍档案失散。于是孔子将其收集整理,重新编辑,将一部分来自周王室所存的中央政治档案编为《尚书》,将鲁之王室档案编为《春秋》,用以传授子弟。^①

《汉书·艺文志》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至于尧,下记于秦。”故《尚书》之古本,与《春秋》、《诗经》一样,都是孔子给予系统编纂的。^②

2

“尚书”名称的由来,旧说以为即“上书”、“上古之书”。孔颖达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也。故曰《尚书》。”《书》孔安国序谓《尚书》一名是西汉名儒伏生所定,“以其为上古之书,故名《尚书》。”然此言实皆大谬。

若上古之书昂为《尚书》,那么难道《易经》不是“尚书”——上古之书?《诗经》不是“尚书”——上古之书?

①《汉书·艺文志》:“书之所起远矣。孔子纂焉。上断自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②《孔子世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愚意以为,《尚书》者,乃“太尚”(宗社)所藏华夏先祖之史传政典文献也。尚,古堂字。太堂,即“太尚”,亦即明堂太室,是上古国家宗社之所在。^①

惟因先王政典存录于此,故尚堂之书乃称“尚书”,即“太尚之书”,亦即国家宗社所藏之史典。而此至简、至明一义,为两千年间治《尚书》者,竟皆不得而明之。^②

值得注意的是,至秦汉时代,宫廷公文书,皆仍称“尚书”。敦煌武威汉简有“尚书臣”之称。汉制有“尚书令”之官职,与太史令、太乐令均隶属于“太常”。^③直到秦汉,仍以所谓“尚书”作为中央政治文件档案处之专称。秦汉法古制,下臣上奏皇帝之书称“上书”,皇家档案收藏之官文书则称“尚书”。此乃“尚书”之又一意义。

《汉书》“艺文志”有“高祖传十三篇”。班固自注:“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可知古代本有记帝王古语及诏策一体裁,而《尚书》正是记录上古帝王“古语及诏策也。”

先秦著作引用《尚书》,多仅称为《书》。虞、夏、商、周四代之典,战国时总称为《书》。亦或称为《先王之书》。唯《墨子·明鬼》篇首见《尚书》一名,曰:“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④说明先秦时期已有《尚书》之名称。^⑤

3

《尚书》所录文献表明,自夏商以来,中国已是文明灿烂、政教严整、法规明确,具有成熟、系统的宗教政治思想和礼仪制度了。

①明堂太室,夏商周称“太社”,秦汉称“太常”或“太尚”,同时为九卿职官之名,主司典章制度、宗庙祭祀、礼乐及选才考试。

②太尚藏书,不仅政典,还有《诗》。《墨子》书中常以《诗》、《书》连言。《墨子·非命》:“夏商王《诗书》”,《墨子·明鬼》引《诗·大雅》“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则称之为《周书》、《大雅》,《书》即《尚书》,《诗》即《诗经》。

③汉称“太常”,秦称“奉常”。《史记·三王世家》:“三月乙亥……尚书令奏未央宫。”《汉书·张安世传》云安世“用善书给事尚书”。

④清代王念孙说:此句文不成义,“尚”与上同,“书”当为“者”,“上者为夏书,其次为商书、周书。”何案其说谬。此断句当如下:“故《尚书》为夏书;其次商、周之书。”或“故《尚书》为夏、商、周之书。”

又,我颇疑《逸周书》原也属于《尚书》,是《周书》之逸篇。

⑤孔安国《尚书序》称:“济南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其说谬,《尚书》一名,来之久远并非伏生所制也。

孔子以《尚书》作为其政治理想、政策及政德的范本,用以教授生徒。在儒家“五经”中,《尚书》始终被置于至尊的地位。以故,《尚书》实际是儒家的大宪之典。

《尧典》所谓:“克明俊德(身),以亲九族(家)。九族既睦(族),平章百姓(国)。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天下)。”即由身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国,由国而天下,正体现了儒家“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化人伦政治理想。

一部《尚书》,可以认为乃是儒家政治理想最完整和最系统化的体现。因此,自汉代以后,《尚书》既是历代帝王所必须研习的基础政治教科书,又是从政的士大夫必读必遵的经宪大法。可以说,一部《尚书》蕴涵浓缩了作为中国 5000 年传统政治道德基石的一组核心价值。

贯穿整个《尚书》的核心理念,应该说主要有四:一是亲民,二是仁善,三是正德,四是中和。所谓亲民,就是相信国家兴亡系于民心。

“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尚书·微子》)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多方》)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季梁语)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桓公元年》虢国史嚣语)

仁即善美与博爱。德即正行与正心。和即多元兼容的协调与统一。仁的思想后来为孔子所发挥而成为儒家之中心价值。和而不同的思想则被用作儒家治国追求的理想境界。

“德”,一是天德,二是民德,三是政德。《尚书》主张为治者必以德而不能依恃于暴力。认为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则兴国,无德必失国。这是贯穿《尚书》德教的基本理念。

实际上,社会契约论或曰民约论的思想,民本、民(人)权与民主的思想,皆非起源于西方,起源于罗马,而是起源于中国,起源于《尚书》。以民为本的政德理念,就蕴涵在《尚书》的亲民与正德之理念中。后来荀子概括之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这其实就是中国要还原的民主思想。

伊尹、周公是商周政治统治经验的系统总结者。华夏政治文化的两位最初传道者。

周公用“以德配天”说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天人感应论”。

他第一次把天的好恶与地上君主的行为联系起来,倡导“修人事以应天命”。他一方面承认天是监临下民、赏善罚恶、公正无私的人格神,“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尚书·周书·君奭》),“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土,日临在兹”。(《诗·闵予小子之什·敬之》)

另一方面强调“敬德保民”可以感动上天,使天命得以长保。周公是用“敬德”改造了早期宗教的天命论。德者,循也。循即规范。规范植规,即私德。私德来自于修养,即修德。天之规范曰道。人群之规范曰循。个人之规范曰德。

“非予自荒兹德”,“予亦不敢动用非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盘庚》)

“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以贯之。”^①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敬天保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为了长治久安,必须使百姓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周公旦最早提出“敬天保民”,要求国君“知稼穡之难,闻小人之劳”。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②

5

以现代政治学眼光观:所谓“德”,其实就是社会契约。而天德就是自然法。^③

这些思想,在崇信暴力以武力征服天下的秦始皇时代被抛弃。但秦亡后,汉初政治家总结暴秦速亡的历史教训,发现必须予以重申和重视。故以治《尚书》出身的贾谊论安国之道为九个字,云:

“民为国本”,“民治则国安”。

他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

①《观堂集林·周制度论》。

②《尚书·无逸》、《荀子·王》。

③老子自然主义,庄子自由主义,孔子制度主义,墨子民主主义,孟子人格主义,荀韩李专制主义。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

“民者万世之本……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以上俱引自贾诩《新书·大政》）

关于刑杀（暴力）与德治之关系，董仲舒则提出：“德主刑辅”，“天之任德不任刑”，“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汉书·董仲舒传》）

中国古典时代的帝王政治，原则上奉行君轻民重的治国原则。所谓“惟以一人治天下，岂能天下奉一人”即此义也。除秦皇、隋炀、朱温等少数被称为“独夫民贼”的暴君以外；中国帝王政治非常不同于中西亚及罗马的暴君专制政治，我以为其根本原因就是奉行了《尚书》所总结的治国治民原则。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理论，西方近代首先由孟德斯鸠所表述，但在先秦儒家理论中已经萌芽。

荀子论“五道”（即治国之道）——提出了礼、乐、刑、政的“四达”。这“四达”中：礼即制度，相当于立法权；刑即司法权；政即行政权。乐（“乐文”）不仅指音乐、美学。“乐以宣情”，指的是控制人心、情感的意识形态。荀子说引《乐记》云：“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记·乐记》）礼以别贵贱，乐文以沟通人心。□

荀子政治思想，是儒家与法家的综合。儒以礼乐为本，而法以法制为具。其根源，皆来自《尚书》。

6

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中国远古之政治中已总结出如此成熟的一套政治理念。此比之 20 世纪流行的权力迷信，以为有权即有一切，靠暴力、镇压可以维持统治（如林彪云：“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权而可以为所欲为云云，前商周的这一套德治观念则更复杂也更成熟，更具深厚的历史感。

中国远古政治历史中之所以能形成数千年一系相承的华夏帝统，出现周汉唐宋明清这样数百年统一文明稳定的伟大帝国，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百折不磨、慎终追远而宏扬光大至今，显示出发达成熟的高度政治智慧，其政治奥秘也在于此。

在传世的古代典籍中，以《尚书》之纠纷为最多。历史上围绕《尚书》的文体及经义解释，围绕其来源出处（所谓“真伪”）及传承问题，曾发生过若干次重大的学术论争和辩论。其中影响至大的即是汉代的“今文”、“古文”学派之争，以及宋、明、清以来关于其书“真伪”及“疑古”之争。

这种学术论争,都不单纯是学派或学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实际反映着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阶级围绕实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斗争。在这种论争的表层语言现象背后,贯穿着为主导国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而发生的重大竞争。

一般来说,古文学派具有崇尚古典主义的贵族价值倾向。而今文学派则具有崇尚庶民本位的平民价值倾向。宋元明清以下,随科举取士建制及学术的普及,《尚书》之学乃由皇家贵族所垄断的官学下降为世俗士民共享的经世之学,由之也发生了质疑其圣经地位的辩伪思潮。

7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李斯建议,焚烧民间私藏诗书,其中《尚书》和《春秋》被列为查禁之重点。但宫中档案则仍得保存(即“中秘藏书”)。秦末人民起义反秦战争中,项羽占据秦都后火烧秦咸阳宫,多数宗社档案皆焚之于一炬。

吕后时代,汉惠帝除禁书令,民间收藏之《诗》及《尚书》复出。

汉文帝时,年过九十的故秦“博士”济南伏生(名胜,山东邹平人)公开传授《尚书》。但是,伏生所传《尚书》,已“失其本经,以口传授”,仅能记诵二十余篇。司马迁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邹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倪宽……”(《史记·儒林传》、班固《汉书·儒林传》)。

《艺文志》著录“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当系伏生后学传本。其经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因此汉人称之为《今文尚书》。

汉景帝、武帝间,鲁共王刘余拆除孔子旧宅,于墙壁内发现孔子家族一批藏书。其中有《尚书》,以“蝌蚪”(周古文字)抄写。刘余遂以其书还予孔子家族人。周代文字汉代已很少有人认识,于是参照伏生所传会文《尚书》,定其可识者,写为隶书。这一部《尚书》比之伏生所传本,多出二十五篇。传其书者,乃孔子后裔中之孔安国。这一部《尚书》,与伏生所传之今文写本《尚书》多所不同。

孔安国本想献奉武帝,但不久遭遇巫蛊之祸,其书遂未能进献。^①

汉武帝年间,司马迁著《史记》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

^①《汉书·艺文志》记:“刘余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几十篇,皆古字也。”按西汉末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史记·儒林传》）司马迁尝从孔安国问故。^①

西晋遭永嘉之乱（公元307-312年）后，王室倾覆，文物沦丧。“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亡。”^②《尚书》亦再度亡散。

东晋政权南迁后，晋元帝时豫章太守梅颐（賾）采录他所收集到的古文《尚书》的一种传本，献予朝廷。此即《尚书》的今日传本（梅氏传本）。^③晋儒皇甫谧即曾采纳《尚书》中古史记述及传说，撰写《帝王世纪》。梅颐所献《古文尚书》计四十六卷（五十九篇），又附《尚书孔氏传》十三卷。其经文四十六卷，与壁古文相近，然内容殊异，实乃西晋学者收集当时传《古文尚书》经文暨《汲冢竹书》中有关文献（如《汉冢周书》等），撰辑而成。

8

《尚书》体例，有典、谟及誓、诰、命五种。（如“虞夏书”有“尧典”、“大禹谟”、“皋陶谟”。夏启伐益，有“甘誓”。）

典谟盟誓的时代，乃是华夏政治国家组织开始形成的滥觞时代。

“典”即政典。^④“谟”即谋议。“誓”，即盟誓约誓，是由自然法、神判法向刑法及刑罚演进的前身。誓有强制之义。誓体之演变，就是后世皇帝之“制”。蔡邕《独断》：“制书者，制度之命也”，亦即法令。这些文体一直传沿到秦汉以下。

①“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②《经典释文·叙录》。

③“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賾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

关于梅颐，《世说新语·方正篇》刘孝标注云：“《晋诸公赞》曰：颐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学隐退，而求实进止。《永嘉流人名》曰：颐领军司马。颐弟陶字叔真。”

蒋善国曰：“梅颐，据明袁氏嘉趣堂（刊）《世说新语》作梅賾，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作枚颐，《音义》作梅颐。朱骏声说：‘古人名颐字真。晋梅颐字仲真，作梅賾者误。’”

但自《尚书正义》误梅颐作梅賾以来，清代学者多仅知梅賾，而不知梅颐。由郑冲把《古文尚书》传到梅颐，都在永嘉乱前。当时不但《古文尚书》仍传于民间，就是三家《今文尚书》汉、魏石经本，马、郑《书经》本，都是极平常书。

④典，纪也，志也。

“诰”是言教,是帝王的演讲、言告之词。秦始皇改诰为“诏”,诏者,教也,诫也。命者,名也,故封授曰“命”,策封王侯曰“命”。孔子之所谓正“名”,要正的就是这种代表等级与身份的“命”。

《荀子·大略》云:“诰誓不(言)及五帝。”誓、诰、命三种政治文体的形成,都在夏、商、周之际,标志着由神权国家走向政治制度化。

今传《尚书》各篇题下皆有短序。班固说:孔子“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准此,则书“序”是由孔子所作。

传者,即训,指口传。“尚书”佚于秦火及秦末兵乱。今所见传世本的原型,都已并非原始文献,而是汉初朝廷向民间儒师征集记述之所得。但是,无论确有遗籍,或来之于口耳之传,或来之于汉晋间儒者纂辑之故典传说(难免有窜乱或附会己意),《尚书》中收录的材料都是具有深远来历的。虽未必全出之于三代旧典,但无一不有所渊源。

其实《尚书》就是远古历史。其中包括两部分:一是古事传说;二是历史文献。西汉司马迁著作《史记》时,东晋皇甫谧著作“古帝王世纪”时,均使用了《尚书》中的史料。”

汉初儒家以《尚书》为政治教科书。西汉初年两位最为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和晁错,都曾从济南伏生受教,都是治《尚书》之学出身。

对《尚书》,汉武帝亦曾有所评论。武帝早年,喜读《诗经》,重视今文公羊派《春秋》经,不重视《尚书》。元狩三年,武帝与伏生弟子倪宽论学,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汉书·儒林传》)自武帝重视此书后,《尚书》对汉唐以下中国之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影响至关重大。

9

西晋永嘉年代天下大乱(公元311年),今、古文《尚书》两系均告失散。

直到东晋之初(公元317-318年),豫章内史梅颐向朝廷献孔安国传述的《古文尚书》计46卷58篇。其中33篇内容与汉伏生旧传今文28篇略同,唯从“尧典”分出“舜典”,从“皋陶谟”分出“益稷”。“盘庚”篇则一分为二。又从“顾命”篇分出“康王之诰”。此外另有25篇也有所不同于汉传本。

梅氏所献之《孔传古文尚书》,当时即被国家视为瑰宝,立于学官。唐初孔颖达受太宗诏命为之作注,此后遂颁行天下。这个传本一直流传至今。

但是,自宋代以后,梅传《尚书》诸篇发生是否汉孔安国所传古文旧篇的“真伪”问题,清代新今文学派兴起,疑古思潮更烈,由之发生对梅颐伪造《尚书》的指责。这种指责由于20世纪初疑古主义的发生而更强烈。

但是,随着地下典籍的大量出土,20世纪初盛行的疑古主义思潮本身也已受到

怀疑和批判。^①近年间,学术界对保存于各种典籍中的《尚书》片段与梅氏传本作严密对勘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篇章是可靠的。因此,清季以来疑古者认为梅氏《尚书》出于梅颐伪造这种说法,作为一种武断的臆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重视了。

梅颐在古《尚书》久已失传之际,汇辑、保存了这批古籍材料,使当时久已失传的《尚书》得以再现,乃是他的重大历史功绩,而绝非罪过。^②

梅传本《尚书》与西汉孔安国传本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的产生原因是可以研究的。究竟是古事古典在流传中自然产生的异变,还是梅氏向壁虚构的捏造?现在看来,只能是前者。近世商周彝鼎金文大量出土,其文体用语与梅传《尚书》非常相似,一些史料互相映证,更证明了这一点!

宋儒朱熹虽对梅氏《尚书》也存有疑虑,但他指出:“对《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

朱彝尊说:“是书久颂于学官,其言多缀辑逸《书》成文,无大悖理。譬诸汾阴汉鼎,虽非黄帝所铸,或指以为九牧之金,则亦听之。”“东晋所上之《书》,疑是王肃、束

①我 1996 年在《诸神的起源》新版序中,痛批疑古主义。

②李友仁说:“孔子用作教材的《尚书》是西周时规范整理过和新撰写的《尚书》,到孔子时又有不合当时语文规范之处,孔子又作规范整理,才用作教材,故有孔子整理《诗》、《书》之说。秦火之后,《尚书》不存,是儒生凭记忆背诵记录而成的,因用的是汉代文字,称为《今文尚书》;后又在孔宅发现孔子所用《尚书》,因是孔子时文字,称为《古文尚书》;东晋梅颐又另献《古文尚书》,因是孔子时文字,亦称为《古文尚书》。

今传《尚书》为《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而真《古文尚书》反而失传。可见这是因为真《古文尚书》是春秋时的语文,已不合汉代以后的语文规范,难以阅读理解,梅颐作了规范整理,和《今文尚书》接近了,所以能和《今文尚书》合编流传至今。

但后人却对梅颐的《古文尚书》冠以“伪”字,未免太轻率了。梅颐若无所据,岂能伪造一两千年前的历史文献?今人也在整理古籍,一两千年后原古籍不存,或存而不能阅读理解,或只能一知半解,对照书名或某些内容,多有不合,难道可以给整理之作冠以“伪”字吗?

历史文献有民间传说和文物古迹可以参证,不要轻易冠以“伪”字,真正的伪作只有小说、戏剧,大家明知其伪,反而不言其伪,愿言其真,追求其生活的真实性,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奇怪。今人都说《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禹贡》、《洪范》等是后儒补充进去的。有关尧的传说和古迹不多,有关舜的传说和古迹不少,有关禹的传说和古迹几乎遍天下。传说的可靠性较差,但古迹的命名却是可靠的,因为地一旦命了名,叫开了,就会世代这样叫,即使统治者为了某种原因改了名,老百姓还会叫很长时间,而且在历代正史的《地理志》中有沿革记载。所以,地名,特别是古迹地名,多数是古代人物历史的有力佐证。”(摘自《易学通解》第 372 页,李友莱均仁著)这些话讲得极好!

皙、皇甫谧所拟作。”“其时未经永嘉之乱，古书多在，采摭缀辑，无一字无所本。特其文气缓弱，又辞意不相连属，时事不相对值，有以识其非真。而古圣贤之格言大训，往往在焉，有断断不可以废者。”

纪晓岚说：“梅賾之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缀逸经，排比联贯，故其旨不悖于圣人，断无可废之理。”他们都在力争梅氏《尚书》作为一部经典的不可废弃。

总之，梅氏本虽然未必源自孔壁古文，但实际可以看作《尚书》在西晋时代的一个纂辑佚本。其中有些章节也的确传自晚周，另一些出自历代经师的转述，皆自有传承之源，绝不能称之为伪书。

10

宋代以后，学术界怀疑主义思潮兴起。南宋吴棫著《书稗传》，开始怀疑梅氏献本《尚书》为伪作。南宋名儒朱熹亦表示疑惑。其立论的主要根据，是今、古文词句深浅难易似有不同。

朱熹说：

“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罔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的，至于易记的全记不得？”《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分析《孔传》和“晚出尚书”（简称“晚书”）的内容，从汉人记载的关于古文《尚书》传授情况、“晚书”的篇数、文体和来源等方面，推测此书应是魏晋间人所述作。

清代阎若璩在梅鷟论证的基础上，写《尚书古文疏证》，从《孔传古文尚书》中提出 128 条证据（今存 99 条），条分缕析。自其以后，《孔传古文尚书》并非汉儒孔安国原始传本这一结论得到了定案。20 世纪初叶，胡适、顾颉刚的疑古学派兴起，梅氏《尚书》受到严重质疑，以至直指梅氏本为所谓“伪书”。

但 20 世纪中叶以后，现代学者根据考古材料及出土金文，对梅氏《尚书》作了重新研究，有了新的结论和认知。

陈梦家认为：梅氏《孔传古文尚书》58 篇中有 33 篇确是伏生所传述，“晚书”25 篇则来源或有可疑。《孔传》并不是西汉“孔安国”所传，而是东晋另一位治《尚书》的学者恰好也叫“孔安国”者所传。^①

^①说详陈梦家《尚书通论》。

11

从西汉到近代,通过两千多年学者由怀疑到考实的反复研究,对于《尚书》之传授纂辑的演变过程已可以形成如下结论:

(1)《尚书》来自周王室所藏先周政典文献。春秋末孔子重新编纂并命名为《尚书》,列入五经用以传教子弟。

(2)遭秦火书劫后,《尚书》一度亡佚。西汉初期(高、文、景时代),济南今文学派大师伏生把这部书中之二十九篇口授记录保存下来。因为使用当时通行的汉隶书文字作记录,因此伏生这一系统传述的《尚书》称《今文尚书》。

(3)伏生之女口授文。文帝时代,晁错向伏生学《尚书》。伏生时年九十,已老衰,命女儿“口传之”,晁错将伏生所授《尚书》以隶书抄录带回朝廷,这就是“今文”之“中秘本”。

伏生的两个学生也将以隶书录写的《尚书》献予朝廷,被立于学官,这就是欧阳及夏侯本。

(4)汉武帝时代,悬赏征藏书,于是发现了《尚书》的几种古代写本。这几种文本都用先秦篆体古文书写,因而称做《古文尚书》。其中一系古文传本出自孔子旧宅壁间所藏。后来为孔安国所传述,此即著名的曲阜孔氏本,此外还有王朝中秘本,扶风杜林本等。

(在古文当中,又有汉代东莱张霸伪造的“百两篇”本,已佚失不传。)

以上《尚书》今、古文的两系传本,虽然内容大同小异,但却形成了讲授《尚书》的两大传统和学派,即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

(5)尚书的传述中,各篇著作时代先后,有些是肯定明白的,有些则仍需要考证研究。

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记载夏代以前的上古史事,但都不是当时的作品。实际是商周以后人纂辑、综述的古事传说。(“曰若”,“稽古”。)

(6)伏生口授流传下来的《今文尚书》,经过历代传写,文字多有讹误,甚至渗入一些后世才有的观念。因之后世之好卖弄聪明者,每每专挑剔于此类枝节,而怀疑其真伪。

(7)以古文传写被称为“隶古定”的《尚书》,祖本已多异同,内容亦有讹误。

于是,东汉熹平年间,朝廷将全部今文传本刻成“熹平石经”。曹魏正始年间,朝廷又将古文传本刻成“正始石经”。但这些石经多已不存,今日都已难窥全豹。

(8)永嘉乱前,《尚书》仍有多种传本流行于世。既有汉代立于学官的今文《尚书》